

负债农户何以走出债务泥潭？——基于民国时期江浙地区的农户调查

摘要：本文以 20 世纪 30 年代江浙地区 1051 家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讨论了民国时期负债农户的生产决策及其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负债农户在调查当年有明显的再次借贷倾向，而且债权人会对债务人索取相对更高的月利率；（2）负债农户会进行理性的生产资源分配，包括压缩农业领域的劳动时间、减少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相关农业生产资源投入，增加副业领域的劳动时间进而提高副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不过，人地关系影响着他们进行产业调整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理性的产业调整能够显著减少再次借贷的概率和金额。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江浙地区的负债农户既没有在债务泥潭中愈陷愈深，也没有丧失债务偿还能力，而是通过行之有效的产业调整走出了债务泥潭，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超负荷的劳动。本文的研究对负债农户的经济行为及其影响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这对了解农户的产业决策模式、理解民间金融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微妙关系、深化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国农村；生产决策

一、引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①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农户的负债问题便是其中之一。部分处于破产边缘的负债农户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和简单再生产，不得不再次走上借贷的道路，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在债务泥潭里愈陷愈深、无法自拔。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借贷处于正规金融体系远未成型，传统借贷逐渐衰落的过渡时期（李金铮，2003，第 5 页），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不过，现有研究近代民间借贷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利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社会网络与借贷需求的关系、无息借贷的选择机制以及农户借贷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②，而对农户负债之后的经济行为缺乏足够的研究。^③本文利用 20 世纪 30 年代江浙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② 利率高低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参见陈志武等《清初至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利率史初探——基于中国利率史数据库(1660—2000)的考察》（《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陈志武等《高利贷与贫困陷阱：孰因孰果——反思民国时期农村借贷的利率问题》（《量化历史研究》2017 年第 21 期）、陈志武等《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经济研究》2014 年第 9 期）、方行《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问题》（《经济研究》1984 年第 4 期）、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等的研究。社会网络与借贷需求的研究请浏览 Kinnan and Townsend. “Kinship and financial networks, formal financial access, and risk re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102 (3), 2012)、林展《社会资本与民国时期的农户借贷——基于 1930 年代北方农村调查》（《求索》2019 年第 3 期）。无息借贷参见李楠《社会网络、连锁合约与风险规避：近代东北乡村无息借贷合约选择机制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农户借贷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参见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 20 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徐畅《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王今诚等《民国时期农村负债问题研究——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陕西关中为考察中心》（《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等的研究。

^③ 根据李金铮（2003，第 25 页）的估计 1933 年长江中下游六省乡村的借款负债率为 58%，借粮负债率为 51%，其中浙江

对民国时期江浙地区负债农户的借贷选择和产业决策进行考察。

20世纪初期的民间借贷一般会被冠以“高利贷”的名号（温锐，2004），事实上，绝大多数借贷利率也确实高于法定的标准。^①于是，农户在进行借贷后会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就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农户不得不依赖新债来偿还旧债（高石钢，2001）。李景汉1932年对河北定县的社会调查结果极具代表性，他发现借新债还旧债的严重后果便是债台高筑，永无出头之日。^②有趣的是，李金铮（2004，第453页）发现，农民为了保全自己的借贷信用，总是尽力偿还，在湖南、江苏等地的调查还发现，违约的情况并不多见；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6，第80-82页）调查也发现，豫鄂皖赣四省典当与代当死票率分别平均为11%和7%。^③由此看来，负债农户在借贷行为发生后可能采取了某些行之有效的对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增加收入、偿还债务的目标。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负债农户的确有显著的再次借贷倾向，包括生产用途借款和非生产用途借款，而且债权人给定负债农户的利率也会更高。不过，负债农户会在产业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即减少在农业领域的劳动，转而增加副业领域劳动，并可以通过这种产业调整逐步提高收入、摆脱对借贷的依赖。

农户是农村经济中的基本单位，他们的生产决策和借贷选择都是其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理性小农学派^④、组织生产学派^⑤、历史学派^⑥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理性小农学派代表人物Schultz（2011，第139-149页）看来，农户就是企业家，他们把农户的行为仅仅理解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组织生产学派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1996，第64-98页）认为，农户的选择并不是考虑成本和收益，而是基于自身的辛勤劳动和消费满足；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智提出了农村家庭收入的“拐杖逻辑”（1986，第193页），即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非农收入是农业收入的重要补充。不过，戴乐仁等（1928，第94-95页）、曹幸穗（1996，第169页）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第127页）的研究表明，越贫困的农户，耕地面积越少，副业收入越高、在家庭收入中占比越大。费孝通（1986，第200页）认为，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惟有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如此看来，穷困潦倒的农户并不会对困境无动于衷，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生产调整。结合以上理论，产业调整是农户通过农业领域和副业领域的辛勤劳动，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满足基本消费需要的经济理性行为，有可能是农户脱贫致富的开始。

Goodspeed（2016）对爱尔兰的研究发现，大饥荒时期的放贷机构有助于农户改变以马铃薯为主的生产方式，调整粮食种植结构。这表明，债务负担可能是农户进行生产调整的契

省的农户借款负债率为67%，江苏省农户借款负债率为62%。事实上，真正的农户农户负债率可能比正式公布的调查统计还高（行政院农业复兴委员会，1933，第133页）。

^① 国民党政权的法定标准以年利20%为线，共产党政权理论上根本否定利率，所以标准是权宜的，如年利10%、15%等（陈志武等，2017；李金铮，2004，第633-637页）。

^② 李景汉：《定县农村借贷调查》，《中国农村》1935年第1期。

^③ 如此高的偿还率或许与当物作价抵有关（陈志武等，2017）。

^④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⑤ （俄）A.恰亚诺夫（А.Чаянов）：《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⑥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机和窗口。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江浙地区的农户在面对债务负担时存在产业调整行为，他们会显著减少在农业领域的劳动时间和资源投入，增加副业劳动时间。虽然当时中国家庭副业生产工具落后，经营规模狭小，经济效益低下（李金铮，2003，第86页），但是，副业生产能够使得农家更充分利用劳动力^①，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徐畅，2004）。从长远来看，这种由负债负担引发的产业调整，不仅促使小农经济破产，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高负债率不仅仅表示农村经济的衰败，更体现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徐畅，2004）。

本文以卜凯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进行的农户调查数据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以民国时期的负债农户为切入点，分析他们在债务负担的条件下所做出的借贷选择和产业决策。实证分析发现：在民国时期的江浙农村，负债农户有强烈的再次借贷倾向，包括生产借贷和非生产借贷，而且他们必须面对更高的利率；不过，负债农户会对家庭的生产资源分配进行调整，即减少农业领域的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投入量，增加副业领域的劳动时间进而提高副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通过这种理性的调整，负债农户可以显著减少再次借贷的概率和金额。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利用民国时期江浙地区乡村社会的微观调查数据，从金融角度和产业角度实证分析了负债农户的行为决策，进一步充实了对民间借贷的研究；其次，经过对负债农户行为决策效果的检验，本文发现，积极从事副业生产是农民走出债务泥潭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从一个全新视角丰富了民国农村经济发展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最后，本文的研究对于重新审视民间金融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对江浙地区乡村借贷、产业发展等基本状况进行简要的介绍；在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变量选择进行必要的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的汇报；最后为本文的结论。

二、历史背景

江浙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是经济发展较为活跃的区域。然而，在近代全国农村经济一片凋敝的大环境中，江浙地区的农村经济亦是如此。在外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农产品价格下跌、生产力下降，再加上课税繁重、天灾人祸等因素冲击，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农村经济一片疮痍。

农家的收入能否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是判断农户是否进行借贷的重要依据。戴乐仁（1928，第62页）估计，每一个农家一年的生活费用至少需要150元，李宏略（1934）估计的最低生活费用是292元^②，李金铮（2003，第62页）认为李宏略的估计反映的地区更为广泛，代表性更强。鉴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活水平较其他地区高，因此，最低生活费用可能要高于综合估计的292元。

表1展示的是1934年江浙地区农家的收入状况，若以292元为最低生活标准，大约90%

^① 根据卜凯20年代的调查，在江浙地区种1英亩水稻需要劳动力76天，1英亩茶叶需要126天，一英亩桑园则需要196天（王丽丽，2004，第41页）。这一方面体现出经济作物要比粮食作物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另外一方面表明以养蚕业为代表的副业可以充分利用季节性闲置的劳动力和家庭辅助劳动力（妇女、儿童以及老人）。

^② 在20世纪30年代，不少学者曾经对此话题做过估计，但因对最低限度生活的理解不同，估计的结果差异较大（李金铮，2004）。

的农户不能维持生计。如此一来，只能通过借贷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因此负债农户在江浙地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虽然在当时新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已经建立，但是民间借贷依然是农户借贷的主要来源（咎金生，2018，第70页）。

表1 1934年江苏、浙江乡村农家收入各组户数比率

户数百分率 (%)	年收入分组(元)							
	100以下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500	500-1000	1000以上	调查不明
江苏12县	34.16	36.4	15.19	6.56	3.13	3.53	0.72	0.74
浙江15县	43.42	36.97	10.88	4.05	1.62	1.95	0.6	0.61

资料来源：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第34-36页整理。

在农民负债后，许多农民是无法及时偿还债务的，再次走上借贷的道路实属无奈之举（咎金生，2018，第84-85页）。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结果，江苏省1934年的借贷农户中，身背债务的占总数的57%，到1935年达到63%；浙江省1934年的借贷农户中，身背债务的占总数的54%，到1935年达到63%。^①

农户从事耕种以外的生产经营活动，皆可称为家庭副业（李金铮，2003，第84页）。在当时的农村，“单靠农业收入，不能维持生活”^②，故农户会从事副业经营以增加收入。^③据资料显示，不少农户会从事商贩或手工业，也有人会背井离乡外出谋生^④。徐畅（2005）认为农户从事的副业主要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他还认为经营副业的过程往往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20世纪30年代的江浙地区农户普遍收支不平衡，贫困是农户负债的根本原因，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民间借贷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当时的生存需要和生产需要（温锐，2004），但是在债务泥潭中愈陷愈深的风险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江浙地区农户负债以后的经济行为是我们了解江浙地区农村经济再生和发展的窗口，也是理解江浙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全新视角，值得深入探讨。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

（一）卜凯1929-1933年农村调查

1929-1933年的农村调查是由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美国人卜凯教授主持、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生指导，以抽样调查方法为主进行的（卜凯，1937）。此次调查的完整数据库涉及22个省，172个地区^⑤，是除了满铁调查资料之外，为数不多的农户层面系统的调查数据。

^① 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农业经济科：《农情报告》1937年第5卷第7期。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③ 以种桑业为例，荡口镇大地主华翼纶曾说“栽桑利润比种粮至少高出四、五倍”（王丽丽，2004，第33页），笔者认为这里面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是植桑业的收入应该比种粮要高一些。另外，种桑的收益高于种稻也可以从田地租金得到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的绍兴，1亩稻田的租金为70-100元，而一亩桑田的租金则为100-150元（王丽丽，2004，第34页）。

^④ 兰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兰溪县志》，1990年，第668页。

^⑤ 其中，4个地区（江苏江都、江苏宜兴、江苏东台、湖北天门）的调查时间在1924-1925年，其余168个地区的调查时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江浙地区的农户行为，故选择《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浙江篇》和《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江苏篇》中的东阳地区、汤溪地区、桐庐地区、余姚地区、灌云地区、淮阴地区、昆山地区、无锡地区以及盐城地区的 1051 个农户的家庭状况数据和生产行为数据，其中包括家庭规模、从事农村工作和副业的劳动时间、家畜数量、农场中不同用途的土地面积、农场肥料生产数量、储蓄、借贷和债务情况、特殊支出情况等。

不过，陶诚（1990）、钱俊瑞（1934）等对卜凯的调查数据提出过质疑，比如选取的县和农户不够典型，调查人员家境较好导致样本具有选择性等。^①当然，也有学者对卜凯的农村调查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梁方仲、黄宗智、马若孟等。^②

（二）数据描述

数据描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江浙地区农户的负债情况和借款情况，从而对负债农户的借贷行为有初步的认识，第二部分是对用于实证分析的变量进行统计描述。

通过卜凯的农户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对 1930 年左右江浙地区农村的民间借贷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表 2 展示了 1930 年左右江浙地区农户负债情况和借款情况，在 9 个地区的 1051 户农户中，在过去五年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数量为 550 户，其中江苏 348 户，浙江 202 户，负债率分别为 64.4%和 39.5%，借款数量分别为 45203 元和 60708 元；调查当年借款的农户为 341 户，其中江苏 194 户，浙江 147 户，分别占比 35.9%和 28.8%。负债比例与历史背景部分《农情报告》所公布的负债率基本吻合。

最值得注意的是负债农户的借款情况，在江苏省调查当年借款情况统计中，过去五年存在债务的农户占比高达 78.35%，浙江省相对低一些占比达到 52.4%。由此看来，负债农户再次借贷的概率远大于之前没有负债的农户群体，这一方面说明负债农户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说明农户必须警惕在债务泥潭中愈陷愈深的风险。

表 2 1930 年左右江浙地区农户的负债与借款情况

地区	过去五年负债情况			调查当年借款情况			负债农户借款情况	
	户数	金额	负债率 (%)	户数	金额	占比 (%)	户数	占比 (%)
江苏	348	45203	64.40%	194	14297	35.90%	152	78.35%
浙江	202	60708	39.50%	147	53750	28.80%	77	52.40%
总计	550	105951	52.30%	341	68047	43.40%	229	67.20%

注：负债率的计算公式为：过去五年有债务负担的农户数量/总农户数量；调查当年借贷用户占比的计算公式为：当年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数量/总农户数量；负债农户借款情况占比的计算公式为：过去五年有负债

间为 1929~1933 年。

^① 陈志武等（2017）对卜凯的调查数据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的数据进行比较，除去边远地区的甘肃、绥远和宁夏差别较大外，两个独立调查结果基本保持高度一致，并不能支持抽样的质疑。本文选择的浙江地区数据比较一致，而且，本文旨在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统计描述并非主要目标，因此不影响本文得出的结论。

^② 胡浩，钟甫宁，周应恒编著：《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浙江篇》，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 页。

负担且在调查当年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数量/当年存在借贷行为的农户数量。

数据来源：据胡浩，钟甫宁，周应恒编著：《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浙江篇》，第 404-415 页计算整理；据胡浩，钟甫宁，周应恒编著：《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江苏篇》，第 401-417 页计算整理。

表 3 展示了 1930 年左右江浙地区农户生产用途借款和非生产用途借款的基本情况。在生产用途借款和非生产用途借款的月利息比较方面，生产用途平均借款金额明显低于非生产用途平均借款金额的情况之下，生产用途的平均月利息却显著低于非生产用途的平均月利息。根据彭凯翔等（2008）的发现，民间借贷利息的高低是与借款的规模相关的，即规模越小利率越高，温锐（2004）认为，利息的高低也与借款的风险大小密切相关，即借款风险越高利率越高。如此来看，在 1930 年左右江浙地区的农村，风险因素对月利息的影响大于借款规模对月利息的影响。从债权人的角度，他们通过生产用途借贷相对更低利息为债务人提供一种生产激励，以期早日将本息收回。在负债农户的借款用途方面，在江苏省调查当年的生产用途借款统计中，负债农户占比接近 90%，在浙江省调查当年的生产用途借款统计中，负债农户占比为 44%，两省存在一定的差异^①。但是平均来看，生产用途的借款中负债农户占比为 72.9%，略高于非生产用途的借款中负债农户占比 69%。在李金铮（2003，第 54-55 页）、傅建成（1997）等学者的研究中，用于生产用途的借贷农户数量显著高于非生产用途的借贷农户数量。而在本文以负债农户为视角的数据集中，用于生产用途的借款比例要高于非生产用途的借款比例。这表明，江浙地区的负债农户作为借贷农户群体中风险较高的一类人，与首次借贷的农户群体有一定的差异，他们的借贷一方面要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生产方面的改良和提高，以期提高收入水平、早日还清债务。

表 3 1930 年左右江浙地区农户生产用途借款和非生产用途借款的基本情况

地区	生产用途					非生产用途				
	户数	金额	平均借贷额	平均月利息/分	负债农户占比 (%)	户数	金额	平均借贷额	平均月利息/分	负债农户占比 (%)
江苏	94	4995	53.13	2.11	88.30%	168	9302	55.37	2.68	79.20%
浙江	50	3771	75.42	1.442	44%	119	10676	89.71	1.51	54.60%
总计	144	8766	60.88	1.88	72.90%	287	19978	69.61	2.19	69%

注：据胡浩，钟甫宁，周应恒编著：《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浙江篇》，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404-415 页整理；据胡浩，钟甫宁，周应恒编著：《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江苏篇》，

^① 这种差异可能与浙江省总体负债率较低有关，由于该话题与本文主题不符，在此不做讨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01-416页整理。

本文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是农户是否存在债务负担，若该农户在过去五年的借款总额大于0，则认为该农户是有债务负担的，否则，则认为没有债务负担；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负债农户的借贷选择，即在调查当年是否有借贷行为、借贷的金额、借贷的用途以及借贷的利率，另外一方面是负债农户的产业选择，即农业生产方面的劳动时间投入以及副业生产方面的劳动时间投入；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该农户的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的人员规模、农舍面积的大小以及各类特殊支出的金额；第二部分是农户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情况，包括经、纬度^①。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4所示。

表4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描述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有负债（是=1）	<i>Debt</i>	1051	0.523	0.500	0	1
当年是否借贷（是=1）	<i>Loan</i>	1051	0.388	0.488	0	1
生产借贷月利息（单位：分）	<i>Rate1</i>	1048	0.258	0.709	0	6
非生产借贷月利息（单位：分）	<i>Rate2</i>	1045	0.601	1.147	0	6
家庭规模（单位：人）	<i>Size</i>	1050	5.356	3.085	1	29
农舍面积（单位：地方亩）	<i>House</i>	1031	0.827	1.213	0	10
农场工作时间（单位：月）	<i>Work1</i>	1050	1.949	1.234	0	8.5
副业工作时间（单位：月）	<i>Work2</i>	1051	0.415	0.582	0	4.85
副业收入占比（%）	<i>Rate3</i>	982	15.944	20.324	0	90
役畜数量（单位：头）	<i>Animal1</i>	1051	0.488	0.765	0	7
农场种植面积（单位：地方亩）	<i>Area</i>	1051	36.021	65.417	0.34	640
特殊支出（单位：\$）	<i>Expenditure</i>	1047	113.752	186.586	0	2250
纬度	<i>Latitude</i>	1051	31.388	1.864	29.05	34.42
经度	<i>Longitude</i>	1051	120.007	0.643	119.04	121.15

注：（1）在原始数据表中，存在部分“u”，意为“未知”或“不详”，本文在回归中按数据缺失处理；

（2）农场工作时间和副业工作时间均已等成人劳动折算，女工纯粹从事家务劳动的，在此处不计入，从事农场以及副业的工作月数乘以0.8，童工工作月数乘以0.5；（3）其中役畜均以每一头黄牛为一标准单位，其他役畜包括水牛、马、骡、驴等，视其食量和其所产粪量之多寡化为黄牛之倍数或分数。（4）特殊支出包括：结婚、嫁妆、祝寿、生子、丧葬等。（5）副业工作包括：鱼贩、肩贩、织布、茶房、经商、接生、编草帽、做豆腐、贩猪等。

四、实证策略与回归结果

（一）负债农户的借贷选择

本文该部分将着重考察负债农户的借款倾向、借款用途以及需要承担的借贷利率。故将

^①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会影响农户的借贷行为和产业选择，但是由于笔者并不能确定该调查所在的具体年份。因此，以经纬度来代替，另外，经纬度也可以控制各农户所在地区的习俗、文化等因素。

模型设定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text{Debt}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 表示农户当年借贷数额和借贷利率， Debt_i 表示该农户过去五年的负债额度，本文主要关注的系数是 β_1 ， X_i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Size）、农舍面积（House）、特殊支出（Expenditure）以及纬度（Latitude）、经度（Longitude）等， ε_i 是随机扰动项。

表 5 汇报了有关负债农户借贷行为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调查当年借贷的额度，主要解释变量为该农户过去五年的负债额度，第（3）、（4）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当年进行生产用途借贷的额度，第（5）、（6）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当年进行非生产用途借贷的额度。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β_1 的系数均为正向显著，这表明，负债农户存在明显的借贷倾向，其中包括生产用途借款和非生产用途借款。^①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第一，负债农户的生活条件可能更差，过去的借贷并没有解决贫困这一根本性问题，农户始终在贫困、借贷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不得不通过继续借贷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第二，负债农户为了提高家庭收入，需要对家庭的生产方式进行改进，不得不通过借贷补生产资金之不足。

表 5 负债农户的借贷行为回归分析

	Log (Loan)					
	(1)	(2)	(3)	(4)	(5)	(6)
<i>Log (Debt)</i>	0.549*** (0.061)	0.449*** (0.061)	0.483*** (0.128)	0.384*** (0.132)	0.534*** (0.058)	0.390*** (0.059)
<i>Log (Latitude)</i>		0.135 (0.918)		-3.156 (2.022)		-1.986** (0.906)
<i>Log (Longitude)</i>		12.970 (13.010)		10.830 (28.010)		29.680** (14.200)
<i>Log (Expenditure)</i>		0.101*** (0.027)		0.075 (0.0545)		0.096*** (0.028)
<i>Log (House)</i>		0.004 (0.054)		0.059 (0.119)		-0.037 (0.050)
<i>Log (Size)</i>		0.573*** (0.162)		0.229 (0.251)		0.570*** (0.184)
<i>C</i>	1.275*** (0.260)	-62.210 (62.860)	1.152** (0.570)	-39.970 (135.90)	1.125*** (0.238)	-134.900* (68.650)
<i>Observations</i>	249	240	110	109	215	206

^① 为了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当年是否存在借贷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过去五年是否负债为解释变量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与 OLS 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无异。

<i>Adjusted R²</i>	0.313	0.397	0.198	0.224	0.344	0.440
-------------------------------	-------	-------	-------	-------	-------	-------

注：（1）模型的估计方法为 OLS；（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但是，在调查的 1051 个农户家庭中，既是负债农户，又在调查当年存在借款行为且各项调查数据均齐全的农户只有 240 户，分别存在生产借贷和非生产借贷的农户数量更少。那些没有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可能存在借贷需求，但是因为负债累累等原因没有借到钱。考虑到这一现实问题和本文使用的数据类型，直接使用 OLS 回归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可以使用 Heckman 两步法进行处理。本文参考杨汝岱等（2011）和林展（2019）的做法，将家庭中健全男子占比作为选择方程的识别变量，这一变量符合排他性条件。^①

Heckman 两步法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发现，过去五年的借贷额度与当年借贷额度依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过去五年借款额度的系数变化不大，这说明有债务负担的农户确实有强烈的借贷倾向，存在深陷债务泥潭的风险。

表 6 负债农户的借贷行为 Heckman 两步法回归分析

	Log (Loan)		
	(1)	(2)	(3)
<i>Log (Debt)</i>	0.446*** (0.054)	0.383*** (0.097)	0.388*** (0.053)
<i>Log (Latitude)</i>	1.146 (1.313)	-2.336 (4.288)	-0.321 (1.569)
<i>Log (Longitude)</i>	35.890 (24.030)	20.910 (53.650)	50.540** (20.300)
<i>Log (Expenditure)</i>	0.109*** (0.027)	0.084 (0.065)	0.095*** (0.026)
<i>Log (House)</i>	-0.004 (0.0523)	0.068 (0.107)	-0.052 (0.0517)
<i>Log (Size)</i>	0.702*** (0.191)	0.264 (0.288)	0.744*** (0.205)
<i>C</i>	-176.400 (118.600)	-91.590 (271.600)	-241.700** (101.600)
Select			
<i>Rate</i>	-0.876*** (0.269)	-0.526* (0.319)	-0.923*** (0.280)
<i>Log (Latitude)</i>	2.023**	4.069***	3.014***

^① 家庭中健全男子占比的计算公式为：健全男子数量/家庭规模，并用 *Rate* 来表示。

	(0.836)	(1.052)	(0.852)
<i>Log (Longitude)</i>	43.470***	45.700***	31.550***
	(9.915)	(12.200)	(10.160)
<i>Log (Expenditure)</i>	0.012	0.044*	-0.009
	(0.019)	(0.024)	(0.020)
<i>Log (House)</i>	0.010	0.049	0.004
	(0.043)	(0.053)	(0.044)
<i>Log (Size)</i>	0.229*	0.147	0.260**
	(0.118)	(0.144)	(0.122)
<i>C</i>	-215.900***	-234.300***	-162.400***
	(48.390)	(59.780)	(49.620)
<i>Number of obs</i>	936	991	956
<i>Nonselected obs</i>	696	882	750

注：（1）“*”、“**”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7 汇报了负债农户在当年进行借款时的月利息情况。其中,第（1）、（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用于生产用途借款的利息,第三列、第四列的被解释变量为用于非生产用途借贷的利息。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在进行借贷时的月利息会显著提高,不过生产用途借贷的利率系数要比非生产用途的利率系数低一些。结合历史背景部分对于利率的分析,这一方面体现了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早日还清债务的激励,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民国时期江浙地区的负债农户很有可能面对“利滚利”造成的债台高筑、无法自拔的艰难生存环境。

表 7 负债农户借贷时的利率回归分析

	<i>Rate</i>			
	(1)	(2)	(3)	(4)
<i>Debt (Yes=1)</i>	0.251***	0.314***	0.412***	0.419***
	(0.042)	(0.047)	(0.070)	(0.078)
<i>Log (Latitude)</i>		1.458***		4.545***
		(0.416)		(0.780)
<i>Log (Longitude)</i>		19.850***		15.730***
		(3.416)		(5.823)
<i>Log (Expenditure)</i>		0.002		-0.0181
		(0.008)		(0.013)
<i>Log (House)</i>		0.065***		0.054*
		(0.018)		(0.029)
<i>Log (Size)</i>		0.091*		0.277***

		(0.049)		(0.089)
	0.127***	-100.000***	0.385***	-90.970***
<i>C</i>	(0.023)	(17.140)	(0.049)	(27.850)
<i>Observations</i>	1048	1022	1045	1019
<i>Adjusted R²</i>	0.030	0.088	0.031	0.102

注：（1）模型的估计方法为OLS；（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负债农户的生产决策

温锐（2004）认为要理解民间借贷的社会性，必须将它放到农村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中去考察分析。张东刚等（2009）、徐畅（2005）等学者均发现负债可能会导致农民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进而影响农业生产的进行。徐畅（2004）对苏、浙、皖三省的考察指出，江南地区的民间借贷有助于农户发展副业，在此基础上通过超负荷的劳动获取超额经济收益。本文将在该部分对负债农户的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分别进行考察。

表8汇报了负债农户在农业领域的生产决策。其中，第一列、第二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农场工作时间，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都会显著减少农业的劳动时间；第三列、第四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农场的种植面积，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都会显著减少农场中农作物的种植面积^①；黄牛、骡子、驴等役畜是不可缺少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衡量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傅建成，1995），为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第五列、第六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户的役畜数量，同样的，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都会显著减少役畜的数量。由此看来，如果农户背负了债务，他们会显著的压缩农业领域的劳动时间，减少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削减农业方面的资源投入。当然，本文并不能排除在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以及缩减役畜数量方面存在超经济强制行为的可能。

表8 负债农户在农业领域行为回归分析

	Agriculture					
	(1)	(2)	(3)	(4)	(5)	(6)
<i>Debt (Yes=1)</i>	-0.041*	-0.031*	-0.715***	-0.313***	-0.125***	-0.099***
	(0.0230)	(0.0178)	(0.0735)	(0.0486)	(0.0256)	(0.0231)
<i>Log (Latitude)</i>		0.990***		-0.631		-0.324
		(0.166)		(0.430)		(0.200)
<i>Log (Longitude)</i>		-7.016***		-10.860***		-27.350***
		(1.644)		(3.926)		(1.991)
<i>Log (Expenditure)</i>		0.024***		0.015		0.007*
		(0.004)		(0.010)		(0.004)

^① 在原始数据表中，农场面积主要分为种植面积，农舍面积，道路、池塘、坟墓面积等。

<i>Log (House)</i>		0.024*** (0.008)		0.737*** (0.023)		0.109*** (0.010)
<i>Log (Size)</i>		0.525*** (0.021)		0.353*** (0.053)		0.326*** (0.028)
<i>C</i>	1.030*** (0.0173)	30.230*** (8.069)	2.994*** (0.0565)	57.010*** (19.420)	0.365*** (0.020)	131.900*** (9.755)
<i>Observations</i>	1050	1025	1051	1025	1051	1025
<i>Adjusted R²</i>	0.002	0.491	0.083	0.671	0.022	0.365

注：（1）模型的估计方法为OLS；（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9汇报了负债农户在副业领域的生产决策。其中，第一列、第二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负债农户从事农场副业工作的劳动时间，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都会显著增加在副业的劳动时间；为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在第三列、第四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副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同样，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会显著增加副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由此看来，为增加家庭收入，摆脱债务负担，负债农户的确会进行相关的产业调整，即压缩农业领域的资源投入，增加在副业领域的资源投入。

表9 负债农户在副业领域行为回归分析

	<i>Sideline</i>			
	(1)	(2)	(3)	(4)
<i>Debt (Yes=1)</i>	0.081*** (0.021)	0.054** (0.0220)	5.403*** (1.282)	2.619** (1.319)
<i>Log (Latitude)</i>		-0.147 (0.191)		10.900 (11.370)
<i>Log (Longitude)</i>		-3.738* (1.947)		-7.391 (109.300)
<i>Log (Expenditure)</i>		0.020*** (0.005)		0.789*** (0.276)
<i>Log (House)</i>		-0.059*** (0.010)		-4.957*** (0.574)
<i>Log (Size)</i>		0.168*** (0.028)		-0.799 (1.506)
<i>C</i>	0.239*** (0.015)	18.240* (9.570)	13.130*** (0.879)	6.293 (541.300)
<i>Observations</i>	1051	1025	982	956

<i>Adjusted R²</i>	0.013	0.103	0.017	0.105
-------------------------------	-------	-------	-------	-------

注：（1）模型的估计方法为 OLS；（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负债农户走出债务泥潭的关键在于进行适当的产业调整和理性的生产资源分配，而不是一味的进行农业的“过密化”生产。不过，黄宗智（1986，第 118 页）指出，对于土地相对较多而劳动力相对较少的农户，他们不一定会选择放弃部分粮食作物生产，转而将生产资源投入经济作物种植和副业劳动中。对于这部分农户而言，他们有足够的土地满足整个家庭的消费，而且经济作物种植和副业生产要付出远大于农业生产的辛苦劳动。也就是说，面对债务负担，人均种植面积不同的农户对于产业调整的动力是不同的，相对人少地多的农户进行产业调整的动力最小，相对人地均衡的农户进行产业调整的动力次之，相对人多地少的农户产业调整的动力最大。接下来，本文将检验以上猜想。

表 10 不同人均耕地面积的负债农户对产业调整的回归分析

	(1)	(2)	(3)	(4)	(5)
	农业劳动 时间 (log)	种植面积 (log)	役畜数量 (log)	副业劳动 时间 (log)	副业占比
<i>Debt (Yes=1) × Motivation</i>	-0.028*** (0.008)	-0.236*** (0.020)	-0.069*** (0.009)	0.051*** (0.010)	3.152*** (0.615)
<i>Log (Latitude)</i>	0.986*** (0.163)	-0.738* (0.411)	-0.366* (0.195)	-0.141 (0.191)	10.390 (11.300)
<i>Log (Longitude)</i>	-7.226*** (1.624)	-12.040*** (3.742)	-27.600*** (1.932)	-3.346* (1.919)	28.780 (107.500)
<i>Log (Expenditure)</i>	0.025*** (0.004)	0.021** (0.009)	0.009** (0.004)	0.019*** (0.005)	0.671** (0.271)
<i>Log (House)</i>	0.016* (0.009)	0.672*** (0.024)	0.091*** (0.010)	-0.044*** (0.011)	-3.964*** (0.611)
<i>Log (Size)</i>	0.532*** (0.021)	0.409*** (0.051)	0.343*** (0.027)	0.157*** (0.028)	-1.348 (1.480)
<i>C</i>	31.250*** (7.981)	62.950*** (18.570)	133.200*** (9.486)	16.350* (9.448)	-165.000 (533.500)
<i>Observations</i>	1025	1025	1025	1025	956
<i>Adjusted R²</i>	0.496	0.703	0.386	0.124	0.132

注：（1）模型的估计方法为 OLS 模型；（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本文将负债农户按人均种植面积^①进行降序排序，将前三分之一的农户定义为相对人少地多的农户，并将其“Motivation”定义为1；中间三分之一的农户定义为相对人地均衡的农户，并将其“Motivation”定义为2；将后三分之一的农户定义为相对人多地少的农户，并将其“Motivation”定义为3。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可以看到，第（1）、（2）、（3）列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且较表8第（2）列的显著性有所提高，这表明负债农户面对的土地压力不同，减少农业生产投入的意愿是不同的；第（4）、（5）列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且较表9第（2）列的显著性有所提高，这表明负债农户面对的土地压力不同增加副业生产投入的意愿也是不同的。由此可见，人均种植面积不同的负债农户对于产业调整的动力确实是不同的，土地相对短缺的负债农户有更强的产业调整意愿。

（三）负债农户脱离债务泥潭

本文前面部分的实证结论发现，负债农户有强烈的再次借贷倾向，且必须接受更高的借贷利率，面临着深陷借贷泥潭的风险；不过，负债农户会对家庭的产业进行调整，他们会显著增加副业投入而减少农业投入，这样的产业调整是否有助于负债农户提高收入水平，进而走出债务泥潭呢？

表 10 负债农户的产业调整对借贷影响的回归分析

	Loan				
	(1)	(2)	(3)	(4)	(5)
<i>Debt (Yes=1) × Log (work1)</i>	0.365*** (0.029)	0.393*** (0.0273)	0.678*** (0.130)	0.713*** (0.126)	0.785*** (0.130)
<i>Debt (Yes=1) × Log (work2)</i>	-0.132** (0.062)	-0.152** (0.059)	-0.825*** (0.221)	-0.737*** (0.218)	-0.336 (0.379)
<i>Debt (Yes=1) × Rate3</i>					-0.010* (0.006)
<i>Log (Latitude)</i>		-0.911*** (0.246)		1.017 (1.058)	0.656 (1.091)
<i>Log (Longitude)</i>		13.510*** (2.588)		76.420*** (11.550)	74.280*** (11.960)
<i>Log (Expenditure)</i>		-0.006 (0.006)		0.026 (0.025)	0.038 (0.026)
<i>Log (House)</i>		-0.035*** (0.012)		0.002 (0.052)	-0.012 (0.055)
<i>Log (Size)</i>		0.086*** (0.033)		0.361*** (0.140)	0.277* (0.149)

^① 人均种植面积=农场种植面积/家庭人口规模。

C	0.222*** (0.016)	-61.500*** (12.680)	1.041*** (0.079)	-369.100*** (56.880)	-357.500*** (58.99)
<i>Observations</i>	1050	1025	1050	1025	956
<i>Adjusted R²</i>	0.147	0.190	0.031	0.079	0.085

注：（1）模型的估计方法为 OLS 模型；（2）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10 汇报了负债农户进行产业调整对借贷行为的影响。其中，第（1）、（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在调查当年借贷，若存在借贷行为则为 1，否则为 0，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与农业劳动时间的交换项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负债农户与副业劳动时间的交换项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这表明：增加农业劳动时间会显著增加借贷概率，而增加副业劳动时间会显著减少借贷概率；为使结论稳健，第（3）、（4）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调查当年借贷的金额，同样，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负债农户与农业劳动时间的交换项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负债农户与副业劳动时间的交换项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这表明：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并不能减少借贷的金额，增加副业劳动时间却可以减少借贷金额；为进一步讨论该影响的作用机制，在第（5）列，本文将副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加入回归模型，发现其吸收了副业劳动时间对借贷金额回归的显著性，而农业劳动时间的显著性不受影响，这说明副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比的变化是影响借贷金额变化的主要途径。因此，提高副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会显著减少再次借贷金额。这表明，江浙地区负债农户的产业调整是卓有成效的，假以时日，能够使他们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进而走出债务泥潭。

通过以上实证结果可以发现，江浙地区的负债农户不仅存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而且面临深陷债务泥潭的风险，不过，他们通过行之有效的产业调整，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债务偿还能力，逐步走出债务泥潭，尽管为此付出了超负荷强劳动的代价。不过，由于江浙地区特有的气候条件、人口密度、土地资源、人文环境等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该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区域限制。

五、结论

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发挥着解农民生活之所困、补农民生产资金之不足的重要作用。然而，现有关于近代民间借贷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博弈，讨论债务负担对于农户经济行为影响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利用 20 世纪 30 年代卜凯对于江浙地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对民国时期负债农户的金融选择、生产决策进行考察。

研究发现：在民国时期的江浙农村，负债农户因为种种原因具有强烈的再次借贷倾向，即使需要面对更高的利率；不过，他们会对自己的家庭劳动时间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即增加副业领域的资源投入、压缩农业领域的资源投入，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程度的人地矛盾会影响他们进行产业调整的意愿。实证分析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生产决策，可以显著减少负债农户再次借贷的概率和金额。由此可见，江浙地区的负债农户并没有在债务泥潭中愈陷愈深，而是通过理性的产业调整，逐步减少了对借贷的依赖，实现了增加家庭收入、走出债务

泥潭的目标。

本文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利用近代农村微观数据对负债农户的金融选择和产业决策进行考察,丰富了民间借贷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而且从新的角度阐述了民间借贷与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微妙关系,这对理解江浙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具有一定的意义。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数据的限制,本文的讨论仅仅是初步的。

参考文献

- [1] (俄) А.恰亚诺夫 (А.Ч а я н о в) 著; 萧正洪译. 农民经济组织[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2] (美) 西奥多·W.舒尔茨著; 梁小民译.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08.
- [3] 卜凯主编. 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 [4] 曹幸穗著. 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5] 陈志武, 林展, 彭凯翔. 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 清代债务命案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 49(09): 162-175.
- [6] 陈志武, 彭凯翔, 袁为鹏. 高利贷与贫困陷阱: 孰因孰果——反思民国时期农村借贷的利率问题[J]. 量化历史研究, 2017(Z1): 1-32.
- [7] 陈志武, 彭凯翔, 袁为鹏. 清初至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利率史初探——基于中国利率史数据库(1660—2000)的考察[J]. 清史研究, 2016(04): 36-52.
- [8] 戴乐仁等著; 李锡周编译. 中国农村经济实况[M]. 北平农民运动研究会, 1928.
- [9]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0] 高石钢.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农村高利贷对农家生活以及农村经济的影响[J]. 固原师专学报, 2001(01): 40-43.
- [11] 胡浩, 钟甫宁, 周应恒编著. 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浙江篇[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12] 胡浩, 钟甫宁, 周应恒编著. 卜凯农户调查数据汇编 1929-1933 浙江篇[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 [13]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 华东农村经济资料 第2分册 浙江省农村调查[M]. 1952.
- [14] (美)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5]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 豫鄂皖赣四省之典当业 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第4号[M]. 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 [16] 李金铮著.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7] 李金铮著. 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18] 李景汉. 定县农村借贷调查[J]. 中国农村, 1935, 1(6).
- [19] 李楠. 社会网络、连锁合约与风险规避: 近代东北乡村无息借贷合约选择机制的考察[J].

-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01):65-80.
- [20] 林展.社会资本与民国时期的农户借贷——基于1930年代北方农村调查[J].求索,2019,No.313(03):55-62.
- [21] 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8(05):147-159.
- [22] 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农情报告汇编[M].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
- [23] 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03):92-98.
- [24] 王今诚,付建成.民国时期农村负债问题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关中为考察中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5(05):30-36.
- [25] 王曙光等著.农村金融与新农村建设[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26] 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4(03):184-217+3.
- [2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 [28]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浙江省农村调查[M].商务印书馆,1934.
- [29] 徐畅.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J].江海学刊,2004(04):141-148.
- [30] 徐畅.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J].近代史研究,2005(02):78-122+7.
- [31] 薛暮桥,冯和法.《中国农村》论文选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32]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11):116-129.
- [33]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11):116-129.
- [34] 咎金生著.江南农村金融研究 1912-1949版[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8.
- [35] 张东刚,关永强.1930年前后中国农家收支状况的实证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8(02):87-91.
- [36] 吴知著.近代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商务印书馆,1935.
- [37] 王丽丽.江苏近代生丝出口贸易及对农村经济的影响(1895—1936)[D].南京农业大学,2004.
- [38] Goodspeed T B. Microcredit and adjustment to environmental shock: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Famine in Ireland[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 121: 258-277.
- [39] Kinnan C, Townsend R. Kinship and financial networks, formal financial access, and risk reduc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3): 289-293.
- [40] Morse A. Payday lenders: Heroes or villai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How can indebted farmers get rid of their debt burden: Based on a survey of farmers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051 farmers i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in the 1930s, and discusses the production decisions and effects of indebted farme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Indebted farmers have a clear tendency to borrow again during the survey year, and creditors will demand relatively higher monthly interest rates from debtors; (2) Indebted farmers will mak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resources, including compressing labor time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reducing crop planting area and relat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ource inputs, increasing labor time in the sideline sector, and thereb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ideline income in household income. Debt farmers will mak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resources, including compressing labor time in the agricultural field, reducing crop planting area and relat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source inputs, increasing labor time in the sideline field, and thereb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ideline income in household incom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affects their willingness to make industrial adjustments.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is rational industrial adjust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robability and amount of re borrowing.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indebted farmers i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did not get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debt quagmire, nor did they lose the ability to repay their debts. Instead, they emerged from the debt quagmire through effective industrial adjustments, despite their excessive labor.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economic behavior and its impact of indebted farmers, which has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dustrial decision-making mode of farmers, the sub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vate fi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odity econom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financial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credit; Rural area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duction decisions

